

绪论

第一章

第一节 近现代东亚变局下的文物流散

在 20 世纪初的全球化浪潮中，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和日本，经历了由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快速演变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的转型。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经历了持续的动荡与变革，例如，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北洋政府的混乱统治，以及国民党政府初期的政权更迭等。与此同时，中国书画等珍贵文物开始大量流失海外，除了欧美市场，日本也成为重要的流入地。这一时期中国文物的流失呈现出双重路径：一方面是战乱和社会动荡导致的文物破坏、盗掘和流散；另一方面则是国内外市场上的文物交易造成的流失。可以说，文物流失海外的路径映射了近代殖民体系下传统东亚秩序解体过程中物质文明载体的命运轨迹。

中国文物于近现代大量流往海外的趋势，始自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这场以军事暴行开启的文化浩劫，不仅摧毁了“万园之园”的宏伟建筑，更导致园内珍藏的历代典籍、书画、青铜器等万余件文物

被劫掠一空，开启了近代中国文物流失的灾难性序幕。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探险家”与东方邻国日本的“考察队”纷至沓来，甚至形成了体系化的文物攫取网络。例如，瑞典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自19世纪90年代起六次深入中国西北，其在1899—1902年的中亚考察发现并带走大量楼兰古城文物；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以“学术考察”为名，在1900—1916年四次赴敦煌，从道士王圆禄（1850—1931）手中骗购敦煌遗书近万卷；^[1] 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将大量敦煌汉文写本、地方志和丛书、金石拓片等带回法国。^[2] 这些行为往往打着“科学考察”的旗号，实则与殖民扩张互为表里。

日本的文物掠夺同样系统化展开。例如，日本美术史先驱冈仓天心（1863—1913）自1893年起六度赴华“考察”，其足迹遍及龙门石窟、云冈石窟等佛教艺术圣地，通过实地测绘、摄影记录等方式获取大量研究资料。^[3] 与此同时，建筑史家关野贞（1868—1935）自1910年起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古建筑展开系统性“调查”，其测绘的《中国建筑》图集直接服务于日本对东亚建筑谱系的重新建构。^[4] 最具破坏性的是大谷光瑞（1876—1948）“探险队”在1902—1914年的三次西域考察，这支由僧侣、军人、学者组成的特殊队伍，在日本军方与财阀的支持下，共劫掠佛教写本、汉文文书残片约9000件，其中在吐鲁番出土的《李柏文书》等珍品至今流散东瀛。^[5] 这种以学术研究为名的文物掠夺，实质上是近代殖民主义体系下对文化权力的暴力重构。

[1] 王冀青. 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J]. 敦煌学辑刊, 2007, (3): 60—76.

[2] 陈恒新.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的来源与文献价值考略[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8, 36(2): 112—119.

[3] [日]冈田健. 龍門石窟への足跡: 岡倉天心と大村西崖[G]//东京国立文化財研究所. 語る現在、語られる過去: 日本の美術史学100年. 东京: 平凡社, 1999: 128.

[4] 徐苏斌. 東洋建筑史学の成立に見るアカデミーとナショナリズム: 関野貞と中国建築史研究[J]. 日本研究, 2002(26): 53—141.

[5] [日]大木彰. 非国書資料としての大谷探検隊将来資料[J]. 大学図書館研究, 2019, 113: 2045—1—2045—8.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收购行为尤为引人注目，其背后既有“脱亚入欧”政策的驱动，也反映了日本试图通过文化手段彰显自身现代化成就的意图。在“脱亚入欧”政策的影响下，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收购兴趣愈发强烈。一方面，日本试图通过收藏中国文物来彰显自身文化的优越性，摆脱“中国中心主义”的束缚，实现文化的“欧洲化”；另一方面，这种行为也迎合了西方对东方艺术的兴趣，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在文化领域的“西化”进程。^[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日本客商纷纷来到中国，成立洋行进行书画等文物的市场交易活动。例如，日本古美术商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1880—1951）自 1908 年起将分店开在北京，以学者型书商的姿态系统地收集包括敦煌经卷、甲骨文、《四库全书》散本在内的众多中国古籍珍本，其《文求堂善本书目》成为追踪我国流失遗珍的重要参考。江藤涛雄（1877—1952）自 1898 年起跟随兄长江藤正雄前往中国经商，在西安古玩街开设“长安庄”，经营草药生意之余，也兼营输出中国文物至海外的买卖。他在西安和东京上野都有居所，方便中日之间的古董买卖。由他经手的文物，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院大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书道博物馆等地。此外，原田庄左卫门（1858—1938）及原田悟朗（1892—1980）家族经营的原田博文堂凭借深厚的京都学派学术背景，与内藤湖南（1866—1934，又作内藤虎次郎）、长尾雨山（1864—1942）等知名中国学家建立了紧密的学术与商业联盟，借此将董其昌、八大山人等明清书画作品系统地引入关西收藏界。这种文物收购行为不仅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也体现了其在“脱亚入欧”政策下试图通过文化手段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意图。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伴随着清王朝帝制的动摇和崩溃，在政情不安和军阀混战，以及清废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等背景下，除清宫内府（内务府）、恭王府等皇家收藏之外，以贵族、官宦和富商为代表的民间私

[1] Gao F, Hao X. The “Leave Asia” Strategy of Japan Starting from “De-Sinicization” in Ideology and Culture[J].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2022, 10(12): 682-692.

藏形成了一个流失海外的高峰。^[1]如上所述，这一时期，大量珍贵文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出中国，其中不少被日本古董商收购并转售至海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初，日本山中商会（Yamanaka & Company）作为东亚最重要的古董跨国商号之一，深度参与了中国文物在全球范围内的买卖。该商社由大阪古董商山中吉兵卫于1894年创立，其子山中定次郎（1866—1936）通过系统化的文物交易网络，将数万件中国文物转售至欧美市场。1901年，山中商会在北京设立分店，利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通过代理人网络在华北、山西等地大量收购文物。1912年，山中定次郎以“修缮王府”名义取得恭亲王溥伟的信任，一次性购得恭王府旧藏2000余件精品，包括书画、青铜器、玉器等，这批文物经分类后分批在纽约、伦敦拍卖，引发西方收藏界震动。据上海书画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的《山中商会经手中国艺术品资料汇编》介绍，20世纪初日本山中商会中国艺术品日本展销会的图录达10余种，包括青铜器、书画、石造像、陶瓷、家具、文房等各类珍贵艺术品6000余件。

实际上，中国文物的外流并非始于近代。历史上，中国书画流入日本的准确起始时间难以考证，但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追溯至奈良、平安时代（公元8—12世纪）。在这一时期，通过遣唐使、入唐僧、入宋僧及民间贸易等途径，大量的佛教写经、汉文抄本以及书画真迹被传至日本。^[2]例如，唐代双钩摹本《丧乱·得示·二谢帖》（现藏于宫内厅）三帖合卷和唐内府摹本《孔侍中帖》（前田育德会藏），是“二王”书法传播至日本的重要标志。当时的绘画以青绿山水和佛画为主，这一点从正仓院所藏的中国文物中可见一斑。此后，中国书画在各个朝代不断传入日本。接下来，笔者将解释在中国书画流入日本的时代划分中，近年常用

[1] [日]鹤田武良. 原田悟朗氏聞書：大正昭和初期における中国画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A]//中国明清名畫展[Z]//日中友好会馆. 中国明清名画展：中国天津艺术博物馆秘藏. 东京：日中友好会馆，1992；Netting L. J. A Perpetual Fire: John C. Ferguson 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2] [日]塚本磨充. 千年宝藏多元历史——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收藏和其故事[J]. 书与画, 2021, (8): 16-29.

的几个学术概念：“古渡”“中渡”和“新渡”。

12—14 世纪传入日本的宋元绘画和禅僧墨迹，统称为“古渡”书画。“古渡”书画以室町时代足利将军家收藏的“东山御物”^[1]为代表。根据足利将军家的文化侍从能阿弥所编的《御物御画目录》记载，自足利义满（1358—1408）起，历代足利将军所收藏的中国绘画共计 90 个主题、280 幅作品，其中不乏传为梁楷、牧溪、马远、夏圭、李公麟、钱选等名家之作。而“中渡”书画则指的是江户时代传入日本的黄檗僧墨迹、唐船法帖，以及渡日清人画家的作品。“中渡”的主要代表包括隐元隆琦、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等黄檗宗僧侣的书法作品。进入近现代，流入日本的中国藏品主要以清宫内府（即内务府）和贵族官宦的收藏为主，涵盖北宋、元、明、清的名家绘画、六朝碑拓、精良宋拓、旧拓集帖，以及宋至清末的各类书法。这类藏品被称为“新渡”或“新舶载”，尽管被称为“新渡”，其内容仍以古代中国书画为主。这些藏品大多散落于日本的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大学等机构，或为私人收藏，部分则再次流向欧美的艺术机构或进入国际艺术市场流通。本书的研究重点正是“新渡”中国书画在日本的流播情况。

近现代以来，随着中国主流美术品的海外流出，欧美和日本对中国文物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中、日两国因地理位置上的“一衣带水”优势，加之海上航运业的发展，上海作为重要的文物集散地和国际贸易港口，成为书画输出日本的“出口港”，而东京和大阪则成为中国书画进入日本的两大“进口港”。这三个城市之间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交流圈。^[2]大批中国书画流入日本后，日本迎来了中国古代绘画收藏的黄金时期。在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罗振玉（1866—1940）、大村西崖（1868—1927）等

[1] “东山御物”指的是室町时代，特别是足利义满至足利义政时期，足利将军家族所收集的中国书画和器物，主要有宋元时期的绘画、书法、茶器、花器、文具等。

[2] Maeda T. (Re-) Canonizing Literati Pain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Kyoto Circle[C]//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215—227; Shen K. The Shanghai-Japan Conne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 世变形象流风：中国近代绘画1796—1949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2008: 233—258.

学者的引领与推动下，20 世纪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以关西和关东为中心、以重新认识中国书画主流传统为特征的收藏群体。^[1]在日本积累的中国古代书画藏品中，有许多已被认定为日本“国宝”或“重要文化财”，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重要地位。

自 21 世纪以来，日本的博物馆与美术馆持续举办多场聚焦于近现代流入日本的中国书画展览，凸显了中日艺术交流史中收藏、鉴赏与再阐释的多重维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展览包括：2007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率先推出“高岛菊次郎氏寄赠中国书画：槐安居收藏”特展，系统地展示了高岛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与价值；2011 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观峰馆、京都国立博物馆等九家美术馆联合举办“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特展，全面呈现了该地区中国书画收藏的形成背景与地域特色；同年，京都国立博物馆还举办了“笔墨精神：中国书画的世界”特展，精选上野理一收藏的历代中国书画名品，引发广泛关注；2016 年，大阪市立美术馆举办“从王羲之到空海：中日书法名迹”特展，系统地梳理了书法艺术自东晋至日本空海时代的发展历程；2018 年是展览活动的重要节点，大阪市立美术馆为纪念阿部房次郎诞辰 150 周年举办了“阿部房次郎与中国书画”特展；2019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推出“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特展，以唐代书法为主轴，展出包括北宋《五马图》在内的诸多重量级藏品；2021 年，京都国立博物馆策划“新闻人的眼光：上野有竹与中日书画名品”特展，从报刊人的鉴藏视角切入，呈现中日艺术交流中的个人网络与跨界影响；2023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与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联合举办“王羲之与兰亭序”特展；2024 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中国书画精华：宋元时代的名品”系列展览则集中展出如梁楷《雪景山水图》、米芾《虹县诗》、赵孟頫《玄妙观重修三门记》等宋元书画精品。这

[1] 陶徳氏. 内藤湖南と清人書画：関西大学図書館内藤文庫所蔵品集[M]. 吹田：关西大学出版部，2009；関西中国書画コレクション研究会，[日]曾布川寛. 中国書画探訪：関西の收藏家とその名品[M]. 东京：二玄社，2011.

些展览从不同主题与角度出发，持续推动人们对中国书画在日本传播与收藏史的再认识，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与展示平台。

然而，随着全球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持续繁荣，流散至日本的中国古代书画亦频繁现身于国际重要拍卖场所。以 2019 年佳士得中国香港春季拍卖会为例，其中设有“中国古代书画与澄怀堂美术馆藏品”专场，104 件拍品中约有七成顺利成交。该批拍品多为原藏于日本澄怀堂美术馆的重要藏品，部分作品几经易手，其后或归返中国，或通过“数字人文”技术向公众展示。这些藏品的流通过程体现了当代文物流动与文化价值再定义的复杂关系。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高精度图像采集、三维建模、在线展览等为代表的“虚拟回流”模式，正在与实物追索同步推进，形成“数字呈现 + 权属主张”并行的新型文物归属机制。尽管部分中国书画因时间流转、自然老化或人为流通而难以实现实物归还，但是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其系统整理汇编与公开传播，亦成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文脉的重要路径之一。^[1] 中国古代书画在日本的鉴藏和空间流转，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中国书画观念变迁的时空缩影，既可以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及其书画艺术的认知、理解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中国书画对于近代全球化建构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与问题视域

国内关于中国古代书画在近代日本鉴赏与展览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书画史的起源、文人画派的传承，以及作品真伪鉴定等传统领域。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海外中国文物”课题逐渐兴起，加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国书画在日本流传、收藏及展览的情况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例如，2014 年，赵秀敏将日本学者富田升的研究成果《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翻译并

[1] 智春丽. 盛世修典：感知绘画里的文化根脉[N]. 人民日报, 2024-11-01(004).

引入国内。随后在 2017 年，汪涛和王立翔主编译介出版了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编《中国书画在日本：关西百年鉴藏纪录》，这两部作品均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界对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的日文著作也进行了系统性的翻译。例如，江静、王立翔主编的《日本中国绘画史研究译丛》（2020）是中国首次对日本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三代学者关于中国传统绘画研究相关著述的大规模移译。

日本学者在 20 世纪早期便开始了对中国书画的研究，其研究主要基于自身的收藏实践和展览活动。例如，大村西崖的《中国绘画小史》（审美书院，1910 年）、泷精一的《文人画概论》（改造社，1922）、内藤湖南的《中国绘画史》（弘文堂，1938）等著作均体现了这一点。在 21 世纪之前，日本研究中国绘画史的重要学者之一是东京大学的铃木敬教授。他致力于梳理和总结山水画的发展历程、各时代主要画风及画派的源流，并积极推动风格史的构建。铃木敬的另一项工作是主持《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的编撰工程，他带领学生和研究助手在日本和欧美地区进行中国绘画藏品调查。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绘画总合图录》出版，该系列图录首次系统性地收录了日本博物馆、私人及寺院所藏的中国绘画。它分为图文与索引共五大册，为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艺术史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铃木敬的研究为小川裕充、宫崎法子、板仓圣哲、塚本麿充、竹浪远等几代学者提供了重要参考。^[1]

1998—2001 年，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延续首次调查成果，在户田祯佑与小川裕充教授的主持下，陆续出版了四册《中国绘画总合图录 续编》。其调查范围持续扩展至欧美、亚洲及日本各地，系统性与全面性获得学界高度倚重，为东亚绘画研究开辟了新视野。2013—2020 年，《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三编》由小川裕充与板仓圣哲教授接力主持出版。这套图录的编撰工程不仅体现了三代学者对基础研究工作的持续推动，也展现了日本对中国绘画研究新老传承的特有学术传统。日本学者的调查工作在补充

[1] 苏浩、邱吉. 21 世纪日本中国绘画史研究——以山水画为中心[J]. 美术, 2023, (2): 6-16.

欧美及亚洲公私藏品的同时，也纳入了澳大利亚等新近调查成果，呼应了全球典藏机构数字化进程加速与多元使用需求的趋势。作为一套横跨四十年的调查成果与图像资料汇编，《中国绘画总合图录》不仅支撑了当代学术研究，更为新时代面对艺术品与文物典藏所展开的跨域整合提供了重要启示。

自千禧年以来，我国与东京大学《中国绘画总合图录》编撰工程相呼应的是浙江大学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该项目是中华文化遗产与发展的重大文化项目，旨在系统性地整理、展示中国历代绘画的珍贵遗产，并通过高质量的图像记录与学术整理，进一步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2005年由浙江大学和浙江省文物局牵头启动以来，该项目收录了来自263家国内外文博机构的12405件（套）中国绘画藏品，涵盖了先秦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绘画作品。项目成果包括《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全书共60卷226册。^[1]通过高精度图像记录与详细的学术分析，该大系不仅为研究中国绘画艺术的学者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全社会展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独特魅力。

除上述研究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研究会”，该学会成立于2010年，是由日本关西地区美术馆、博物馆学艺员、高校研究者及私人收藏家组成的学术团体，致力于系统地研究关西地区中国书画收藏的形成脉络及其艺术史价值。其核心成员包括西上实、弓野隆之、竹浪远、吴孟晋、实方叶子等学者。该研究会以大阪市立美术馆、京都国立博物馆、澄怀堂美术馆等九家机构为主体馆，联合东京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等协作单位，通过跨机构合作开展学术活动。2011年，该研究会整理出版了《中国书画探访》（东京二玄社），简要梳理了各成员馆的收藏史。同年1月至2012年2月间，以“关西中国书画收藏展”为主题，在成员馆巡回展出珍贵藏品，并举办“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的过去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深化相关议题讨论。2013—2018年编纂出版的《关西九馆所藏中国书画录》三卷本，则详细著录了各馆藏品及文献资料。2022年，研究会进一

[1] 赵墨. 盛世修典 赓续文脉 再铸辉煌[N]. 中国美术报, 2023-03-27(006).

步拓展研究维度，主办“中国书画收藏的时空”学术研讨会，探索收藏史与艺术史的多维关联。通过十余年的持续研究，该研究会不仅建立起关西地区中国书画收藏的学术谱系，更构建起博物馆、高校与收藏界深度合作的典范模式，为东亚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照。

在日本公私收藏机构的个案研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国立博物馆、大阪市立美术馆等重要美术馆的藏品梳理与展示工作备受关注。同时，日本地方博物馆及私人藏家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也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相关的专题研究与展览不断涌现。这些努力不仅深化了我们对日本收藏中国艺术品的认识，也促使我们反思在全球化背景下，艺术品跨国流动与地域性文化认同之间的复杂关系。然而，尽管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对日本藏中国艺术品的全面普查工作尚未完成，大量珍贵资料仍散见于各类公私收藏中，未得到充分地发掘与利用。此外，对于日本学者在中国艺术品研究领域的工作与影响，以及中日两国在艺术品鉴赏与学术研究上的互动历史，尚需进行更深入的系统梳理与比较研究。除了朱省斋的《海外所见中国名画录》（1958）、顾延龙的《中国甲午战争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2012）、原田谨次郎的《日本现在中国名画目录》（1975，续编1992—1998）等著名的目录工具书外，关于中国文物在日本的鉴藏与展览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近代日藏中国艺术品的流通研究

（一）田中日佐夫的《美术品的移动史：近代日本收藏家》（1985）^[1]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至战后，日本著名收藏家对私立美术馆、博物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他们购藏的艺术品除了有日本的瓷器、书画、西洋绘画等，还有不少中国的书画和青铜器。

[1] [日]田中日佐夫. 美術品の移動史：近代日本のコレクターたち[M]. 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5.